

文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 880 多首诗、190 多篇散文，收集在《丹渊集》中。苏轼说：“见兄之作，但欲焚笔砚耳！”可见对文同评价之高。明代人钱允治评价说：“文湖州高文健笔，与苏氏并驰。”文同的诗在艺术上突出的成就是以画入诗。钱钟书说：“他在诗中描绘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西洋到 18 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文同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味周围景物，集于笔端，摄为小景，创作了许多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的艺术佳作。文同的诗敢于反映社会现实，对百姓生活十分关注和同情。

文同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篆书、隶书、草书、楷书俱精，尤擅草书。他学草书“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其草书达到“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坐人争索”的程度。人们常将文同“观蛇斗而草书长”，同王羲之观鹅、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相提并论，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李调元

李调元（1735～1802），号雨村。安县宝林镇大沙村（原属绵州罗江县）人。他从小就在父亲李化楠的教导下，以李白“铁杵磨针”的精神刻苦攻读。他聪颖过人，6 岁能对楹联，7 岁能吟诗，11 岁就编出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幼学草》。30 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后任吏部文选司主事、考功司主事。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出任广东乡试副主考，两年后升为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乾隆四十二年，李调元因得罪权贵永保，在考核中被评为“浮躁”而撤职。后经乾隆帝复查，认为他“办事尚属勇往”，乃恢复原职。时人因他不畏权势，称誉为“铁员外”。是年秋，李调元出任广东学政，负责督察广东全省学校教育，主持岁考、科考。他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严惩科场舞弊者。乾隆四十五年，任满回京后，调任直隶通永道道员，管辖北京、长城以南一州六县之地。在任职期间，他利用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的机会，广泛收集资料，编写刊刻《函海》。由于李调元刚正不阿，得罪上司直隶总督英廉和按察使永保。他们罗织罪名，将李诬陷入狱。乾隆四十七年，李调元被流放新疆伊犁。英廉病死后，复任直隶总督的袁守侗知李调元的冤屈，上奏乾隆帝，改流放为削职为民。乾隆五十年，李调元回到家乡，潜心学问，著书立说，吟诗词，写剧本，为后世遗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调元编著的大型丛书《函海》，共 40 函 852 卷，收集了两晋至元明四川文人罕见的文本，其中包括自己的诗文剧作《童山诗集》、《童山文集》等。《函海》的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了文学、历史、地理、考古、金石、音韵、语言、农学、民俗学、书法、绘画、医药、烹饪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如第 21 函《蜀碑纪补》记绵州汉阙为“汉平阳府君叔神道”。

李调元的诗作成就很高，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质朴豪放，不少诗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李调元的诗不仅受到当时国内诗坛的推崇，如著名诗人袁枚称赞他的诗作“才豪力猛”，“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还受到国外诗人的赞赏，朝鲜诗人柳弹素评价他的诗作：“超脱沿袭之陋，一任淳雅之真……格调苍健，音韵高洁。”

李调元才华横溢，创作了许多佳联传世。他对川剧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对戏曲有特别的爱好，在北京做官时就非常喜欢欣赏戏曲表演。回故乡后，又积极从事川剧剧本的创作、理论研究和演出活动。他既是剧作家，又是戏曲理论家，有时还粉墨登场做演员。他写的《雨村曲话》介绍元明两代戏曲作家，介绍各地方剧种的艺术特色、声腔特点和流行剧目，对川剧的高腔、胡琴、弹唱等声腔的来历和特点都作了详细介绍。他还组织“家乐”班，培养了不少川剧艺人。他把元人杂剧和

明清的一批传奇剧本移植到川剧舞台上。《春秋配》、《梅降裘》、《花田错》、《苦节传》等四大弹戏就是李调元的杰作。

李调元还是一位藏书家，他节衣缩食，购置图书，在家乡盖起了一座万卷书楼。该楼在嘉庆五年（1800）被土匪烧毁，年近古稀的老人经不起这个沉重打击，两年后病逝。

孙桐生

孙桐生（1824~1904），字筱峰，号左绵痴道人、忤梦居士，出生于清代绵州城孙家巷的一个书香门第。5岁开始读书，13岁已能作文写诗，29岁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1853）被任命为湖南安仁县令。时值太平军与清军在湖南一带激战，道路不通，无法赴任，只得转回家中。咸丰五年，应聘于岳池县凤山书院为主讲。咸丰七年到湖南，做乡试第一房同考官。他唯才是举，在选拔的人才中有黄锡焘等人，其后以文章、功名显赫于世。是年十一月至咸丰九年九月，代理酃县县令。他看到太平军的威力，懂得官逼民反的道理，他说：“官以民为鱼肉，民以官为寇仇。”因而他“刻刻以洁己爱民为务”。为安定酃县的社会秩序，一方面招练乡勇，加强防务；一方面严惩鱼肉乡民的劣绅，整顿差役，使民困稍苏。因守酃县有功，加知州虚衔。同治元年（1862），委任为安福县令，前任留下一件命案，拖了4年未结案。孙桐生上任后明察暗访，掌握了大量证据后秉公处理，开释了10多个无辜株连者，百姓称之为“神君”。这年冬，代理全州知州，在两个月时间内，迅结积案100多件，又救济灾荒，减价平糶，救活难民数万，百姓称之“包青天”。次年任桃源县令，上任后清理历任积案500多件，打击了地方恶势力，追缴了地主豪绅拖欠的税金8万多两，免除了强加于百姓头上的不合理负担，将应交钱粮数公告于民，不准层层加码。桃源百姓对“孙青天”赞不绝口。同治八年，任永州府代理知府。永州政务废弛，吏治民风败坏已极。孙桐生上任后，整顿吏治，严惩危害百姓的土豪、书吏、讼棍、衙役，秉公审案，平反冤狱。对前任知府错判的案子，予以重判。因此得罪了已升为道台的前任知府，代理知府不足1年便被免职。他深感官场黑暗，决计引退，于同治十一年夏回到家乡。因家境日益贫困，又别无生计，于光绪二年（1876）再去湖南求官。光绪三年至六年，先后奉调办理宜临、衡州、岳州卡局，悉心整顿税务，禁止刁难商贾，远近称颂。光绪六年夏任彬州知州。彬州地方偏远，地方豪强凶悍嚣张，城乡劣绅鱼肉善良，盗贼公行，白昼抢劫，民不聊生。孙桐生上任后，严惩恶霸劣绅，捕杀盗贼，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光绪八年春，卸彬州任，此时已年近花甲，不想再在险恶的宦海中沉浮，乃携家人返回故乡。孙桐生为官30年，不仅没有买田置地，还把祖宗留下的田产典当了，乃至“典尽寒衣”。回归故乡时，虽有几车行李，但非金银财宝，而是刊刻的书板和书籍。家乡父老仰慕孙桐生的道德文章，聘请他为治经书院主讲。他也乐意培养人才，他说：“培之于数十年之前，收效于数十年之后，国脉盛衰系焉！国势强弱系焉！”他还认为教育与法制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他在晚年主讲治经书院10余年，为家乡培养了不少人才，“左绵学风为之丕变”。

孙桐生在公务之暇，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从事诗文的撰写、编辑、整理、刻印。同治五年（1866）在北京时，他从友人刘铨福处先后借得《妙复轩评石头记》和乾隆甲戌（1752）本《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他细心加以整理，“逐句梳栉，细加排比，反复玩索，寻其义，归其理，如是者五年”。对《脂砚斋评石头记》加了40多条评语和批注。当时《红楼梦》被诬为“淫书”，同治七年，皇帝下旨“严行禁止邪说传奇……著令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销毁”。《红楼梦》也上了“禁书”的黑名单，一时间朝廷内外，上下联手，要将《红楼梦》斩草除根。孙桐生却对《红楼梦》大加推崇，他

说：“喜其洋洋洒洒，浩无涯涘，其描绘人情，雕刻物态，真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而未知其所以奇也……天下无一本之文固若是哉！”他在完成整理工作后，又多方筹集资金，以致典当夫人的陪奩首饰，将《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刊刻出版。他对《红楼梦》的流传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中国早期红学家之一。他还编辑刊刻了《国朝全蜀诗抄》，收集从清初到同治年间蜀中 363 位诗人的 5900 多首诗作，是研究清代四川文艺史的重要文献。他的《未信编》、《永鉴录》、《彬鉴录》、《湘中时政记》等 10 余部著作，是研究晚清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

王右木

王右木（1887~1924），名丕昌，又名燧人。出生在江油市武都镇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曾就读登龙书院、匡山书院，20 岁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后就聘于龙郡中学堂。民国 3 年（1914）东渡日本，就读于应庆大学理化科，想走“科学救国”之路。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王右木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反袁爱国活动，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他逐渐认识到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必须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因而转学到明治大学法制经济科。在这里，他接触到社会主义各派学说，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聆听过进步学者河上肇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民国 7 年，王右木毕业于明治大学，获“政学学士”学位。次年回到家乡。他拒绝大哥王初龄要他去当省参议员的建议，毅然投身革命。当“五四”运动兴起之时，他应聘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当学监，管理学生工作。他在学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力量。时成都高师学生张秀熟（平武人）、袁诗堯（盐亭人）分别担任四川省学联正、副理事长，王右木给他们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要他们多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帮助袁诗堯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 10 年（1921）初，王右木组织马克思读书会，指导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该会是四川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组织，其成员后来大多成为革命骨干。是年 1 月，王右木创办《新四川旬刊》，其宗旨是“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由于经常揭露军阀罪行，旬刊只办了 5 个月就被查封。次年 2 月，王右木又创办《人声》报，他既是社长，又是编辑，也是作者。《创刊号》旗帜鲜明地宣告：本报“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由于该报揭露了驻防江油的军阀滥征捐税、贪赃枉法的罪行，王右木的两个哥哥被捕。二哥王荣昌被拷打致死，大哥王初龄倾尽家财才得以出狱。军阀的迫害并未使王右木屈服，他说：“军阀恨我十分，就是我工作做了十分，彼辈不恨我等，就是我没做工作。”他为了坚持把《人声》报办下去，把自己的工资以及分家的 250 元大洋和妻子的陪奩，甚至典当家具衣物，用来作办报经费。而王右木一家六口经常以稀饭咸菜充饥，他的儿子患病，因无钱医治而夭折。

民国 11 年春，王右木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领导震动全川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他指挥成都的大中专学校师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迫使省议会通过拨肉税为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的提案，补发教师欠薪。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基本上达到目的，但王右木却被成都高师解聘，并遭到追捕。办了半年的《人声》报也被迫停刊。是年 7 月，他到上海与陈独秀、李达、施存统、俞秀松等党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的负责人会晤。青年团总部委托王右木在四川正式建立和发展团组织。10 月，王右木回川，先在重庆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书记部，后到成都，正式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他还按中央指示，把团的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带领团员深入工人群众中，办工人夜校，讲解革命道理，启发阶级觉悟，发展团的

组织，成立“长机帮”等20余个行业工会。在此基础上，于民国12年5月1日，正式成立四川省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成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成都劳工联合会。是年春，王右木回家乡考察后向党中央提出“劳工专政必自掌军权始”的主张，这种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武装的思想，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是年秋，王右木受党中央委派，创建四川省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并担任书记，直接属党中央领导。此后积极贯彻党的“三大”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实现了在四川省的国共合作，他担任国民党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

民国13年2月，杨森占领成都，任四川督理，派秦正树办《甲子日刊》，宣传他的“新政”。秦正树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向王右木汇报此事。王右木决定利用这个报纸宣传革命，担任该刊总编辑，经常发表反对军阀混战，反对防区制，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不久被杨森强令停刊。杨森慑于王右木在群众中的威望，想以高官厚禄加以收买，遭到王右木的拒绝。3月下旬，王右木离开成都先后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秋，从广州返回四川，在贵州土城失踪，可能被军阀暗害，牺牲时年仅38岁。

陈宛溪

陈宛溪（1855~1926），名开沚，号愚溪，三台县万安乡人。父母以务农为生。陈宛溪幼年读书，16岁中秀才。父亲去世后家贫，只得教私塾谋生。此时洋务运动已经兴起，广东商人陈启源成功地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械化缫丝厂“继昌隆”。此事启发陈宛溪创办蚕丝产业，走实业救国之路。光绪三年（1877），他辞塾馆回乡，率家人栽桑养蚕，点滴积累资金，先制手摇缫丝车，后改为脚踏缫丝车，经10余年苦心经营，资金达到40多万贯，桑树培养基地达五六百亩，建起拥有24台脚踏缫丝车的缫丝工场。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积极收集新的科技资料，送儿子入学专攻蚕丝新技术。他四处奔走呼号，提倡实业救国，组织蚕桑会。他编写《裨农最要》、《蚕桑浅学》等科普读物，广为刊发。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宛溪兴建裨农丝厂，引进国外的千叶式煮茧机、缫丝车、分摇机，以蒸气作动力，设6个车间、240个车位。工厂于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投产，成为四川第一家机械化缫丝厂，标志着近代工业企业在绵阳诞生。民国元年（1912），陈宛溪更新设备，引进意大利式缫丝车、英产锅炉、德产发电机，年产生丝300余担，最高年产达440余担，创全省铁机缫丝新纪录。陈宛溪将本厂产品命名为“金双鹿”，决心打造名牌产品，与日本、欧美产品一争高下，为国增光。他认真考察外国产品，认为只要运用先进技术，严格把好质量关，完全可以赶上和超过洋货。他对丝厂管理非常严格，决不在产品质量上有丝毫马虎。他还十分重视对员工的技术培训，亲自编写《丝厂俗歌》、《妇女缫丝歌》，晚上进行培训，让工人能熟练地掌握操作规则和技术。金双鹿牌丝在民国5年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4年后在德国莱比锡博览会再获金奖。金双鹿牌丝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至民国20年，裨农丝厂出口丝7801担、内销丝1102担。

陈宛溪的裨农丝厂带动了三台、绵阳、梓潼以至全川蚕丝业的发展。他培养了1000多名技工，输送到其他丝厂。他还到各县的蚕丝传习所上课，培养蚕丝技术人才。民国4年，他担任三台蚕桑局长，积极督导和推动三台蚕桑业的发展。他亲赴浙江延聘人才，考察蚕桑技术，热情欢迎外地商人到三台投资办厂。重庆商人王静海应召在三台投资兴办永靖祥丝厂。民国11年，三台县已有缫丝车1.5万台，制丝工人2.3万，年产丝15万公斤。除了在川北发展蚕丝业外，还向川南拓展。民国3年，在乐山创办嘉裨丝厂（后更名华新丝厂），工厂占地30多亩，拥有缫丝车120部。他在丝厂大门亲书对联：“由桑以蚕以丝风气先开蜀北；自家而乡而国名声渐及欧西。”横批：“普利全川”。这副对

联表现了他爱国爱乡、走实业救国道路的雄心壮志。他在乐山还投资开办造纸业。民国14年，著名作家李劫人欲办报纸，苦于纸张供应问题，想自办纸厂又缺乏资金和办厂经验，陈宛溪慨然答应投资1万元，集股约2万元，占全部资金的一半，又亲自参加嘉乐纸厂的筹办，担任该厂第一任董事长。该厂在抗日战争中，为打破日寇封锁，保障大后方纸张供应，起了很大作用。

陈宛溪成为川中著名的实业家，拥有家财万贯，生活却十分简朴。他70大寿时，家人和朋友都想大大操办，被他婉言拒绝，自撰一副对联：“做生杀生消尽人财亏己德，未死学死扫除物欲见真天”。他为公益事业常常慷慨解囊，曾捐资创办万安小学，为工友开办夜校，还在乐山捐资兴修大佛公园。民国15年8月，陈宛溪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乐山，享年71岁。各界人士为这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举行了隆重的殡葬仪式。

袁诗尧

袁诗尧（1897~1928），名首群。出生于盐亭县龙顾井（今灵瑞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劳动，后又跟随祖父读书，20岁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他通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触了新思想。

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成都，袁诗尧首先向同学宣读《川报》的有关报道，声讨北洋军阀卖国政府。接着他又和张秀熟一道，组织本校同学参加成都30余所大中学校的大会，并代表成都学生草拟电报，号召各行业一致行动，声援北京。为了便于统一全省学生的行动，6月3日成立了四川省学生联合会，袁诗尧当选为副理事长，负责对外宣传，创办学联机关报《四川学生潮》，对推动五四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9年，王右木组织马克思读书会，由袁诗尧负责具体工作，他在读书会中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后，王右木又和袁诗尧创办《新四川旬刊》，宣传革命真理，揭露军阀罪恶，不久被军阀强行封闭。次年暑假，袁诗尧毕业于成都高师，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王右木要求袁诗尧“要多多散布革命种子，建立川北据点”。袁诗尧利用讲堂给学生传播革命真理，他在进步报刊上自选文章，编成语文教材，还经常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晨报》等进步报刊，指导学生阅读。革命前辈吴玉章在南充中学主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袁诗尧积极参与，组织学生听讲。民国11年2月，王右木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声》报，袁诗尧是主要撰稿人和该报在川北的发行人。是年“双十节”，驻南充的军阀何光烈集合全师官兵举行纪念会，袁诗尧自告奋勇上台演讲，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讲到军队的任务，从北洋军阀罪行讲到四川防区制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军阀。民国12年下学期，袁诗尧指导学生建立读书会、学生联合会和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指导学生学革命理论和时事。他的学生、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的罗瑞卿回忆：“袁老师给我讲了很多新知识，使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主义，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国14年春，袁诗尧回到故乡盐亭县任教育局长。他创办盐亭初中和盐亭师范学校，兼任师校校长。他整顿区乡小学，聘请既有新思想又有学识的教师到盐亭任教。他还办教师培训班，亲自上课，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召集各校师生和机关职员举行悼念大会，在会上他满怀悲痛地作了长篇演讲，高度颂扬孙中山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颂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久上海爆发“五卅”惨案，袁诗尧组织师生罢教、罢课，上街游行宣传，通电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听众群情激奋，当